

定的一面。

政治上的对日斗争,是军事上对日斗争的重要一环。日本自发动卢沟桥事变起,直至无条件投降之前,始终没有停止在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公开的、秘密的、官方的、民间的等等,对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和分裂抗战阵线的活动,虽然诱使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另立傀儡政权,但其诱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如何评价重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坚持抗战,还是力图妥协,仍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应该看到,中国的抗战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形势下,被迫起而应战的;抗战过程中所有的和平攻势都是日本发动的,结果都是由于重庆国民政府的拒绝,日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这便是战时中国对日政治外交斗争的一具基本特点。我们不能把蒋日和谈、对话问题,简单地概括为是对日妥协、投降、抗日不彻底的表现。“苦撑待变”是不容易的。对这一问题的评价,关键是要看如何实现和平?条件是什么?这才是衡量的标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要重视对国民党抗日 游击战场的研究

韩信夫

1989年10月,在卢沟桥纪念馆举办的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了论文《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初探》,提出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既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对日作战战场,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文中论

述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过程；豫东、山西、浙西、豫鄂皖边区及海南等游击区的概况；游击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游击战的采用，游击战场的形成，是持久消耗战略的产物；文末并指出了国民党游击战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我的见解对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传统观点有所突破，论文宣读后引起了争论，有人支持，说“有独到见解”，有人则表示反对。1990年11月17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文中说：“此次学术讨论会，中国国内各地共提出论文33篇，其中颇具新意的是《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初探》一文。”日本名古屋市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赤田清治先生看了报道后向我索阅该文，1990年来华访问时邀我相见。他参加过国民党的游击队，也参加过八路军的游击队，感谢我的论文使他湮没了40余年的一段历史得到了证明。他并说，他感到中国明亮了。

反对意见是否认国民党存在游击战场，认为国民党进行过游击战，但那是为了同共产党闹磨擦、争地盘；还说只有同共产党合作的那部分国民党游击队才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其余相当部分则降日，成了伪军。论者否认国民党游击战场的存在，但却对国民党各战区游击区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避而不谈；只谈国共磨擦，不谈国民党游击队的抗战。至于说只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游击队才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事实则不尽然。事实是：有的国民党游击队（如豫东游击区）同共产党合作，却没有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单独开辟的游击区（如豫鄂皖边区游击区）则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发展为第十战区，接受日军投降。我对自己的见解抱有信心，正如1987年我在西北大学讲课时一位教授对我说的那样，你讲的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通过同赤田先生的相识，几年来的探索，我又发现了第一战区豫北游击区。在以新乡为中心的豫北地区，抗战初期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派第一〇师师长张轸（时任豫北师管区司令）开办军官军事训练班，请八路军派到一战区的联络参谋朱瑞、唐天际为游击战

术教官,讲授政治要领和敌后活动的游击战术。次年2月初,一战区又在豫北招收一批高等专科学校的学员组成一个政治大队,受训学员回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豫北的有识之士,包括某些绿林好汉,在自己的家乡拉起队伍,建立抗日游击队,据目前笔者所知道的,至少有7支民众抗日游击队。其中贺兰亭游击队,在新乡贺堤,有队员450人,是赤田所在的游击队,队员多是当地农民,游击队住老百姓家和庙里,同民众关系很好。游击队里有美军军官操作的无线电台同重庆联络,还接待过重庆派来的指导员。据赤田说,这支游击队很可能是“敌后的一个重要基地”。王国然第八支队是一支规模较大的队伍,王本人是绿林出身,他同汤恩伯部有联系,从汤军取得弹药武器,又把抓到的日军俘虏送到汤军司令部,因此受到战区的嘉奖。八支队在豫北的崛起,引起了洛阳一战区长官部的重视。1939年春,战区政治部派干部到八支队任职。八支队隶属于朱怀冰第九十七军(该军为八支队派来黄埔八期的刘彤轩担任支队参谋长兼新乡县长)。八支队曾转战辉县,封丘、获嘉、修武、武陟、长垣、滑县、延津、原武等县,王本人当过封丘县长。该支队最多达1万人左右,下辖3个团和1个特务营。1940年经过济源整训,支队改隶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九军军长裴昌会指挥。1942年冬,八支队扩编为河北挺进军,王国然被任命为少将副指挥官,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该部岳得功团长,受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遣派进入郑州,岳被任命为先遣军司令,接受日军投降。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中将对岳说:“阁下,你们胜利了,天皇命令我投降。”

在河南,豫东游击区夭折了,但豫北游击区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整个河南,不止这两块游击区,在信阳地区,鸡公山北麓有游击队,桐柏山区也有国民党游击队。至于全国各地,国民党游击区还有不少。这有待于我们继续发现和加强研究。

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过去,我派对这一问题十分陌生,目前我们知之甚少。新的问题被提出了,

难免会有不同认识。这不足为怪。我们应当采取虚心态度,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我相信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以及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区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一争论会逐渐获得解决,最终将达成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

李学通

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这一专题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研究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在大后方经济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认识。我就几个问题谈一下认识。

1、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着手筹划对日抵抗的具体表现之一,尽管所做工作有限,但并非是“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设计委员会”,却是可以肯定的。

2、造成1942年以后大后方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滑坡的原因,虽然不排除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经济统制政策以及官营工业的扩张作用,但1942年初日军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使大后方几乎处于完全被封锁状态,这才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

3、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是战时国民政府最具实质意义,效果最显著的经济措施。它不仅使军需民用得到切实保障,也起到